

新“女性”还是旧“零工”？*

——乡村女性主播群体的短视频内容生产与流动主体性研究

杨雅, 苏芳, 李思雨

北京师范大学新闻传播学院, 100875, 北京

摘要：从交叉分析的视角，流媒体时代处于乡村地区的女性短视频博主的数字劳动和情感劳动亟需关注；数字劳动与媒介可见性之间的张力，落脚于社会性别与主体意识的建构，使新“女性”与旧“零工”之间亦可能存在对话的空间。乡村女性主播的短视频数字实践，既通过数字介质实现了可见性，但同时也面临被算法逻辑所驯化，重新成为免费劳工的风险，这反映了平台经济下流动的流动性。同时，本研究通过剖析束缚在宏大社会结构、中观家庭景观与微观媒介中的乡村女性群体，分析其在反抗标签、自我想象和找寻身份认同的过程中，构造多维生活样态、差异化面向和性别意识的途径。因此，需要尊重一般智力与主体劳动的重新结合，认可乡村女性主播群体数字化生存的付出与实践，即她们从旧的“零工”转变为新的“灵工”，通过自主工作、灵活工作、创意工作，重归劳动的本质与活力。

关键词：交叉分析视角；数字劳动；乡村女性；流动主体性；短视频平台

文献标识码： A

近年来，短视频平台迅速发展，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CNNIC）第54次报告数据显示，截至2024年6月，我国网民规模近11亿人，短视频用户占网民整体的95.5%^[1]。短视频的广泛网民基础、丰富感官通道与多模态虚拟展演，为来自城乡的创作者提供了自我呈现的平台。然而，当前关于短视频的内容生产研究多聚焦于城市或平台头部网红，而乡村地区主播群体作为内容生产的主体在精神和文化层面被不断边缘化，特别是对于特定群体如乡村女性群体关注较少。近年来有研究者从网络空间的身份认同与角色转变困惑、乡村女性身体的呈现等方面出发，探讨媒介场域为乡村女性提供的空间可供性^[2]，但关于媒介可供性与女性身份的探讨依然集中于线性的媒介影响过程，如媒介对女性形象的建构，较少考量到乡村女性背后“三重困境”的深层结构性问题与其媒介生产问题^[3]，包

括乡村生活的社会结构和女性身份在传统社会与现代社会的转变过程、表层网络与现实之间的冲突，以及中观个体与整体的矛盾。因此，从结构性的视角出发对乡村女性的考察，需要从女性在社会框架中的不平等地位与社会认知过程中的偏差角度入手。在媒介内容生产方面，短视频的媒介内容生产过程也伴随着数字劳动与情感劳动的过程，乡村女性用户既是平台内容的消费者也是内容的生产者。

基于此，本研究将以数字劳动与交叉视角为理论坐标系，探讨乡村地区女性主播群体的数字实践与主体性建构。通过分析其特殊的群体形象与短视频创作特征，探讨其内容生产对社会性别意识的影响，勾连流媒体短视频平台的数字劳动视角与性别分析视角，弥合目前学界对于乡村地区女性创作群体的研究缝隙。由此提出研究问题：从本体层面，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一般项目“生成式人工智能背景下数字不平等的评测指标体系及其价值效用研究”；北京师范大学新闻传播学院学术拔尖创新人才支持计划。

乡村地区女性主播群体呈现出何种特质？从平台生产层面，女性主播的短视频内容生产呈现出何种特征？从理论折射层面，乡村地区女性主播群体在数字劳动和交叉性的社会角色方面呈现出何种表现？在动机驱使与非动机驱使、劳动与非劳动、自由与必然之间，探讨乡村地区女性主播群的短视频内容生产、赋权机制、社会角色与主体意识。

1 数字劳动与交叉性视角：短视频平台中的乡村女性研究

1.1 消费与劳动：数字参与向数字劳动的转变

20世纪70年代，加拿大学者达拉斯·斯迈兹（Dallas Walker Smythe）的“受众商品论”开启了政治经济学视角下的受众研究。数字经济时代，传播技术的进步增强了受众的媒介依存，受众的线上线下空间由于媒介而实践紧密交织，“数字劳动”（Digital Labor）的概念兴起。数字劳动的内涵可以从两个层面理解：一是将其视为非物质劳动的当代形式，涉及文化、知识、信息的生产和消费；二是认为其本质还是物质劳动，包括数字媒介技术和内容生产、流通与使用过程中产生的脑力与体力劳动^[4]。此外，“数字劳工”（Digital Worker）则是新技术形态下以数字通信技术、信息和数据等作为劳动工具，以虚拟空间和平台作为生产领域的脑力和体力劳动者^[5]，其并非指某种明确的职业，而是数字化生存境况下从事数字劳动的个体，同时也是媒介技术与平台“使用及应用集体劳动力”的一种复杂关系^[6]。受众既是媒介产品的消费者也是生产者，“产销者”（Prosumer）的身份使他们更加紧密地被连接到虚拟空间的平台规则与算法链条之中，从消费到劳动、从数字参与向数字劳动转变。数字劳动和数字劳工的概念也存在密切的关系，数字劳动的产出往往被平台化、商品化，成为平台增值的来源；而数字劳工在这一过程中，可能面临劳动的无偿性和异化。尤其是在“玩工”^{①[7]}现象中，娱乐与

劳动之间的界限变得模糊、流动性增加，劳动的成果可能被平台隐形占有，出现“弹性雇佣、游戏体验、情感劳动”^[8]等新的劳动形式。

马克思主义非物质劳动的思想启发了受众商品论，也引发了对于“一般智力”^[9]作为生产力参与非物质劳动的探讨。虚拟空间的主播展演与直播短视频内容生产，一定程度上就属于非物质劳动的范畴，即生产的产品与主体的生产行为无法分离。非物质劳动可以分为商业性与非商业性两种，其区分标准主要在于平台资本对于劳动的介入，以及平台和主播之间劳动关系的界定。如果主播是“从事科学和艺术生产的工匠或行家，和资本无关”，那么这种劳动是非商业性劳动；如果主播的无偿劳动被平台弥散性地吸纳，为平台提供劳动者的身体、关系与情感，共享劳动的资料即“一般智力”，同时产出劳动的材料即直播或者短视频内容产品，这在某种程度上就形成了“生产剩余价值”^[10]的商业性非物质劳动过程，即主播成为“数字劳工”。

就经济逻辑而言，传统媒介时代的“二次售卖”理论在社交媒体时代似乎依然适用，媒介平台先将内容产品出售给消费者，再将消费者的注意力出售给广告主。以短视频内容产品来说，主播可以根据产品的内容质量获得平台收入，如点击分成、创作激励、部分受众打赏等；同时，受众的注意投入也使主播获得赞誉度、影响力、粉丝量、点评赞等，并以此获得商业收入，如广告、品牌合作，还可以通过衍生品形式获得盈利，比如直播电商、出版物、知识付费等。在此基础之上，“具有超强中枢节点的平台生态系统，实现了对劳动本身和社会公共性的双重吸纳”^[11]，主播等劳动者也有可能重新成为“局部的工人”，即旧的“零工”（Zero Worker）。因此，如何重现劳动的价值和生产的意义，成为平台化、算法化的智能进程中需要关注的问题。

当前的数字劳工研究，主要分为两个方向，一是以数字经济的产业从业者为研究对象，例如“亚

①玩工（Playbor）指在数字游戏中进行创造性劳动的玩家。

“亚马逊的仓库”；二是以“产销合一”的数字劳动者^[12]作为研究对象。本文着眼于数字劳工研究的第二个方向，关注以快手为代表的短视频平台上的乡村女性用户群体。在网络用户的研究中，多数研究从网络用户的劳工化出发，为互联网用户的内容生产提供了批判检视的视角，如有研究提出，乡村女性群体常被视为社会的“边缘群体”，可以通过另类媒体和数字公地的开拓来扭转社会对于该群体的刻板印象^[13]。在被界定为“边缘群体”的过程中，可能的疑问在于，这种边缘性从何处产生？短视频媒介是否可以作为“另类媒介”使其摆脱边缘化的身份？这一视角在乡村女性的短视频生产和形象建构研究中是否契合？以上问题还需要进一步探索。

1.2 乡村女性主体交叉性与媒介可见性：被边缘化的群体与社会地位

在回答上述问题的过程中，一个有益的视角是“交叉性”（Intersectionality）视角，这一理论关注女性群体内部差异，从不同身份的视角出发，探索如何在宏观社会过程、微观个体和群体层面交织的体系中探讨差异的形成及社会性的影响^[14]。在方法论层面，研究者概括了交叉性的使用，认为交叉性理论在方法上经过了从“范畴内”到“范畴间”分析、从过程分析到系统分析的变迁^[15]，不仅考虑到交叉权力下个体身份的建构过程，还对于社会技术双系统变革背后的多元结构性力量进行探讨，体现宏观制度与微观个体之间的抵抗与收编。

交叉性理论视角可以用于审视女性群体内部的社会分化，分析不同地区女性的日常经验、情感和物质需求。在该视角下，乡村地区女性群体成为天然的分析对象。同时，短视频媒介的可供性，也为乡村女性群体提供了自我形象展演与内容生产的平台。研究发现，短视频中乡村女性可见性生产，是她们与平台之间动态协商和资源争夺的结果，这种生产一方面是自我能动性的展演，而另一方面则是平台规训、城乡二元结构和消费文化下的产物^[16]。同时，短视频平台也隐含了空间生产与消费价值悖论^[17]，作为中介宏观社会制度与微观个人身份之间的媒介景观，为交叉性视角分析提供了平台。

在当下短视频与女性形象展演中，媒介化为可见性、可供性提供了分析视角，但是可见性与社会性别意识和性别文化的勾连，以及数字劳动与非劳动、自身动机与去动机之间的关系，还需进一步探讨。可见性凸显了两个重要的研究面向，一是可见性所体现的“社会—技术”系统下人的数字化生存问题，包括个体视角下可见性的量化；二是可见性所体现的公共意涵，包括在公共领域中少数群体、弱势群体的加冕和斗争。可见性研究体现了拉什笔下“社会与技术相互交织下的个体”^[18]，即，主体在数字化交往中受媒介逻辑影响而展现出的量化与外化的自我，也是个体浸入媒介进行自我想象与社会认同的过程。更为重要的是，可见性意味着权力的流动，具体体现在媒介实践中的注意竞争、群体赋权和舆论构建。英国社会学家约翰·汤普森（John Thompson）认为，媒介化社会中争取可见性已经不仅是一种工具，而是一种社会抵抗的手段^[19]。“可见”意味着一种社会承认，“不可见”被视作社会承认的剥夺。总之，可见性的两个主要研究落脚点既体现了媒介逻辑下主体的能动意识，也反映了在媒介化社会中主体还受到媒介逻辑的影响，体现在社会宏观因素和技术因素对主体的驯化。因此，囿于交叉性社会地位的女性群体在媒介使用中还面临“社会—技术”的复杂系统的生存困境。

2 研究方法和研究对象

2.1 研究方法

本研究采用个案研究法与交叉视角下的系统分析方法（Systematic Model），选取快手短视频平台上乡村地区女性主播发布的直播短视频内容材料，对其进行观察和分析，从而提炼出乡村地区女性主播的短视频内容生产的特点表现与行为规律。

2.2 研究对象

研究对象为快手短视频平台上的国内乡村地区女性主播，因为快手用户多集中于国内的二、三线及更为下沉的城镇乡村，如此选取的样本更具有代表性。本研究借助快手的算法推荐机制，通过热

门推荐不断接触到各类乡村女性的视频, 以及通过快手“乡村幸福带头人”等相关排行, 在2021年6月至8月选择并观察了20位乡村女主播的短视频和直播, 大致可分为五类呈现主题, 选取其中具有代表性的14位乡村女主播作为研究对象(见表1)。

3 “差异化的面向”: 乡村地区女性主播的形象构建

通过梳理快手平台乡村女性主播发布的内容发现, 美食、婆媳关系、个人才艺、日常生活和民族文化是其生产的主要内容。加拿大社会学家欧文·戈夫曼(Erving Goffman)的拟剧理论认为, 个人形象存在前台与后台的展演, 前台形象是自我有意识所构建的^[20], 呈现“多维的身份”和“构造的生活”。在快手短视频平台上, 乡村地区女性主播通过拍摄和呈现短视频, 构建自己独特的形象和生活体验。本研究通过梳理, 将这些主播的形象特征

和内容生产特征概括为淳朴善良的乡村女性、多才多艺的活跃女性及夸张搞笑的诙谐女性。

3.1 淳朴善良的乡村女性

淳朴善良的乡村女性多拍摄自己的乡村生活和劳作过程, 如生火做饭、田间劳动、家长里短、婆媳关系等内容。例如博主“80小影子”居住在辽宁省大连市, 视频内容主要为乡村生活的记录, 其置顶视频是“小鸡炖蘑菇”(拍摄记录做饭的全过程)和“栽土豆”(拍摄记录土豆栽种的全过程)。她的视频场景通常是自家的院子和室内, 也有一些地头田间的场景, 如“抓稻田蟹”“瓦片烤鱼”等。这种淳朴的田间生活、原始本真的制作方式与现代都市风格的精细加工形成了鲜明对比。同其他经过后期美化加工呈现田间美学短视频不同的是, 此类视频是在力图展现真实的乡村生活, 主播常在视频中穿着同一套服装, 也体现了淳朴的形象特征。

乡村女性主播呈现的生活内容, 很大一部分还

表1 研究对象的基本情况

呈现主题	昵称	快手号	粉丝数(万人)	所在地
美食	乡村会姐	287915601	1 406.6	河南省濮阳市
	乐小米	S152886851	35.2	陕西省安康市
	李子柒	1038345419	959.5	四川省绵阳市
	乡村孙老太	Sunguangying888888	378.4	辽宁省沈阳市
	大晶姐的弟弟	6700470	30.4	辽宁省
婆媳关系	乡村婆媳燕姐	Jn413838	76.6	山东省潍坊市
	幸福婆媳12护肤品14包	Lei6444498756	72.2	山东省泰安市
	八零田野一家人	1581168794	12.4	辽宁省沈阳市
个人才艺	云南山歌糖豆豆	Mo1634560959	48.8	四川省成都市
	二妹吖	Thenan666	479.9	河北省邯郸市
日常生活	刘妈的日常生活	Lm520666	1 338.0	内蒙古自治区通辽市
	80小影子	Kying8911	170.4	辽宁省大连市
民族文化	贵州苗家姑娘	W55882357	39.9	贵州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
	侗家七仙女	langmannvshen	116.5	贵州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

注: 粉丝数数据统计截至2023年8月; “幸福婆媳12护肤品14包”为原“乡村幸福婆媳”账号。

来自家庭传播领域中的“关系”问题，如家长里短、婆媳关系等。例如主播“乡村幸福婆媳”所在地为山东省泰安市，该账号共有463个作品，主要记录乡村家庭生活，视频中的家庭成员包括婆婆、公公、老公和孩子，主要呈现体现融洽家庭关系的视频内容，展现出善良的乡村女性特质；主播“八零田野一家人”账号定位于辽宁省沈阳市，短视频发布的主要内容是带领受众回忆20世纪80年代我国东北地区的乡村生活，记录了婆媳和夫妻关系，以及随礼、拜年等民间习俗。

3.2 多才多艺的活跃女性

多才多艺的活跃女性通常是通过展现自己的个人才艺进行形象建构。例如主播“二妹吖”展示的1118个作品和392场直播全部为个人歌唱表演，歌曲内容多是描述乡村爱情生活，拍摄场景多为代表乡村自然风光的田间地头 and 湖边；再如主播“大晶姐的弟弟”通过反串表演，以及服装造型、作品配乐和主播场景装饰，展现了才华横溢的乡村女性形象；也有很多女性主播运用自己的专长加入电商直播，成为“巾帼新农人”。

3.3 夸张搞笑的诙谐女性

夸张搞笑的诙谐女性，以“恶搞”和“戏谑”的视频风格进行破圈传播，如一些视频展现的“土味”形象、夸张的表情和言语等。这些主播在构建自身类型时，有意识或无意识地避开了主流文化，呈现出亚文化的特征，隐含着对自我文化的认同与被主流文化收编的反抗。很多乡村女性主播没有精心设计的服装和道具，而是真实展现生活的样貌与趣味，体现着与城市精致生活、流行文化相抵抗的“乡土文化”和审美观。

以上多面向、多层次的人物线索勾勒出新的乡村女性的形象特质，其共同点在于摆脱了传统媒介话语的形象塑造，是一种“被找回”的性别话语身份，成为女性主义所谓的“主体解放”抽象话语背后的具象化呈现。这种身份特征的呈现伴随着乡村女性或有意识或无意识地抵抗交叉性、边缘性的身份，以第一人称的视角抵抗着镜头凝视的权力，并以“构造的生活”呈现出这种抵抗的过程。

4 “构造的生活”：乡村地区女性主播的内容生产特征

4.1 场景：再现乡村女性日常生活状态

乡村女性主播的内容生产大多以乡村美食、日常生活为主题，展现乡村女性在山间田野劳作、一日三餐的生活。热度很高的主播“李子柒”的视频虽然呈现的是简单的乡村生活，但背后却投入了大量专业制作团队的时间和人力成本。以《芋头的一生》为例，视频讲述芋头从种植到被端上餐桌的整个过程，制作周期长达几个月，以种植为主线并放入大量的空镜，如星空、露水等，将女性务农耕作营造出浪漫主义色彩。这也在一定程度上打破了人们对于乡村女性土气无趣的刻板印象，展现出当代乡村女性的自然之美。

不过，大多数女性主播展现乡村风貌的短视频并非“李子柒”这类田园牧歌式的生活，而是乡村生活的真实呈现。以“80小影子”和“乡村孙老太”为代表的乡村女性主播更多是用直观的拍摄方式，呈现最朴素的乡村女性生活常态。这些短视频的符号呈现方式具有高度相似性，视频背景往往都是乡村的土路、自家房子的水泥墙或者院子瓦房，用手机支架固定后取中近景进行拍摄，以及少数民族地区的乡村女性如实展示当地的民俗风情，如服饰、歌谣、食物等。

4.2 人物：投射乡村女性的多元标签

在选取的样本中，乡村地区女性主播的年龄、职业、地域较为丰富，从东北土炕到西南山林，其中大量内容是对乡村女性的个人才艺的展示和表演。传统对于乡村女性的印象往往停留在单调的劳作，随着短视频内容的传播，这一刻板印象逐渐被打破，乡村女性身上的标签变得更为多元，如“云南山歌糖豆豆”作为乡村女歌手在田间清唱民谣山歌展示自我。多元标签展示了现实社会中乡村女性的多重劳动身份，通过符号与情感叙事进行角色展示或故事演绎。这些主播借助短视频打开了自我表达的窗口，或是专业技能、或是轻松搞笑的表演风格，让她们快速赢得受众的关注和喜爱。

4.3 叙事: 空间地域性强、引发怀旧共鸣

基于同乡的情感纽带,许多乡村女性主播在个人简介页面中都标记了所在的城市或地区。例如内蒙古自治区通辽市的网红主播“刘妈”,其很多视频内容都与蒙古舞有关,从视频内容到语言风格都展现了强烈的地域特色。另外,为了吸引同区域的粉丝,许多乡村女性主播会采用所在地区独有的称呼方式,加之以本地方言辅以普通话字幕的形式,拉近与当地观众之间的距离,展现一种乡土价值与关系的建立。

这些乡村女性主播也常常会在短视频中融入“怀旧”的形式,从而引发受众情感的共鸣。如在短视频的文本中加入大量相应的陈述,“教你做小时候吃过的菜”“从前过年吃点啥”等,或在服饰妆造、场景搭建、音乐选择上使用具有年代感的风格,唤醒短视频主要受众群体在童年和青年时期的乡土“集体记忆”。这种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生活方式和城市的快节奏形成了鲜明的对比,更容易引发观众回归田园的情感共鸣。

5 乡村女性短视频创作的数字劳动与可见性

从交叉性和数字劳动的视角,根据上述女性形象特征和内容生产特征分析,研究认为,随着乡村女性主播的短视频内容得到平台的推广和观众的关注,乡村女性也经历了逐步融入智能技术与“嵌入”社会结构,而后再从中“脱嵌”出来,能动地适应技术并开展主体反抗、自我想象与获得社会认同的过程,这一过程对社会性别与主体意识的发展同样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5.1 话语权的复归,重塑女性媒介形象

从交叉性视角来看,短视频为乡村女性群体提供了表达和展示自我的平台,且多数乡村女性主播暂时未被消费文化裹挟,而仅是借助平台展现独一无二的自我。这一展演打破了一些大众媒体构建的刻板乡村女性形象如“都市外乡人,如打工妹、家政工等,或者是乡村传统女性,如陪读妈妈、乡村

婆婆、留守妇女等”^[21],将话语权复归至个体。短视频平台乡村女性的发声和自我展演,刻画了“新乡村”的风貌,重构了乡村地区“新女性”形象。

此外,这种展演也是对于现代性消费文化的一种抵抗。当下媒介多集中刻画年轻貌美的女性,对于女性审美标准存在刻板化甚至病态化趋向,在一定程度上导致女性被物化,假设女性是“被观看”的客体,否认了女性作为独立主体的形象。由于流量的红利,女性媒介形象不仅没有更加饱满,反而充满了后现代主义的迷思。在此层面上,乡村女性主播的出现,有助于打破这一刻板印象,在新媒介上展现了新女性和另类女性的自我身份认同,并且也获得了其他社会群体的认可。

5.2 乡村空间的复归,打破城乡二元叙事

空间的使用和占有,背后隐藏着交织在一起的各种权力关系。空间的分布也为人们的社会互动提供了可能,成为交叉性分析的新媒介^[22]。乡村女性主播的空间场景多构建于自家房屋、院落、田间地头等,与城市面貌和商业摄影棚的场景形成鲜明对比。这种“空间性的复归”,刻画了新的乡村媒介景观,发扬了新乡村文化,使人们脑海中的乡村文化包含更加细致具体的乡情和乡风。这类短视频并非全然是笼罩着玫瑰色的“田园牧歌”,而是一定程度上“重新界定了城市与乡村的关系与连接方式,乡村空间的复归打破了城市话语的权力格局,两种权力在博弈和角力中给予了文化发展的活力”^[23]。

随着乡土结构与乡村生活在短视频媒介空间中的呈现,“乡村”成为了一种新的媒介景观,引起受众的“点赞”“打卡”等互动参与行为。不过,这种空间的展演和媒介的朝觐,与其说是乡村空间和乡村文化的流行,不如说是在城市想象中的乡村文化的复现。这种乡村样貌的呈现类似法国社会学家亨利·列斐伏尔(Henri Lefebvre)所说的“构想空间”,即,通过符号与权力编纂出的概念化空间^[24]。从短视频展演中的个体来看,空间承载了个体的社会关系,空间的铺陈也是个体能力、阶层、品位的体现,短视频中的乡村空间描绘了乡村地区的家庭与性别关系及礼俗文化等,体现出乡村与城市两种

文化之间的对抗、交织与相互渗透。

5.3 多元主体的认知差异, 性别意识的矛盾呈现

在短视频的媒介呈现中, 我们依然可以反思当下时代是“女性文化社会地位的公然压抑或倒退, 还是一次更为自觉、深刻的女性反抗时代的来临”^[25]。女性在公共空间的可见性部分体现在短视频的内容呈现中, 女性主体呈现出对性别和社会的多元认知, 体现出矛盾的性别意识, 构造出“消极性主体”与“生成性主体”并存^[26]的二元框架。其中, 消极性主体假设了束缚在社会结构中消极被动的个体, 而生成性主体则认为个体在社会结构中依然具有创造性、想象力与自治性来实现积极能动的社会行为, 体现在认知和资源不同摆置下的“混合主体”^[27]概念。

具体表现在, 乡村女性在阶层、性别和经济地位的结构性问题中, 部分女性群体消极、被动地服从于商业逻辑与地位阶层, 强化了性别差异, 导致女性话语权力的失衡。例如, 许多关于家庭关系的短视频中所塑造的“贤妻良母”形象, 将女性的朴素、能干当作理所当然的品质; 乡村女性主播的形象多为皮肤黝黑、脸颊通红、干活勤快, 这似乎已成为乡村女性的固有标签。虽然许多视频都是在讲述其关系和睦的一面, 但背后所隐含的由于男女分工不同而导致的性别差异依然被进一步强化, 乡村女性的话语权依旧失衡, 不利于社会性别意识的树立。

不过, 在平台多元文化和多维角色的呈现中, 能动主体的女性形象与积极性别意识形态的撒播, 也有助于更多乡村女性主播构建起积极能动的形象。在短视频中, 许多女性主播开始反思一些社会刻板印象, 打破性别二元对立的迷思, 强调女性的独立劳动和独立地位。例如主播“璇妈努力生活”通过在短视频中强调自己的经济和精神独立, 呼吁更多女性群体做新时代女性, 也试图撕掉旧观念下乡村女性的标签。此前, 女性被认为是缺乏公共经验的群体, 只能实现乡村公共事务的“制度性参与”而非“实质性参与”^[28], 短视频平台能够为女性群体提供群体连接纽带与公共经验的传递, 产生

策略性选择与自主反思的可能性, 以及日常抵抗社会性别问题的群体性力量。

5.4 看与被看, 乡村女主播数字劳动的可见性与公共性

在短视频的智能算法下, 被算法突出的注意规模所产生的“可见性”, 形成了可见社群或注意社群, 成为圈层传播中的舆论基础^[29]。短视频平台上形象展演的可见性体现了主体的反抗意识和自我想象, 其目的在于寻求社会认同。因此, 在数字平台上形成了流动的自我形象, 不受传统的刻板成见所束缚, 女性群体突破性别和阶层的固定空间, 在媒介时空下反复展演、循环、剪裁和抵抗。在社交媒体所给予的性别可见性方面, 女性群体既可以呈现“反叛的身体”, 也逐渐形成虚拟场域的“姐妹情谊”^[30]。这种从个体经验出发的可见性, 逐渐在公共领域对话中呈现出公共性的特征, 同时, 性别与边缘群体的可见性也折射出乡村女性群体嵌入智能技术与社会结构中的数字化生存与适应的问题——乡村女性个体或群体如何打破数字不平等? 如何通过平台上的自我表露、展演来影响权力分配? 如何进行算法对抗与脱嵌, 找到自己的独特生存之路?

由于用户的注意资源有限, 短视频平台中的内容创作者被迫卷入了激烈的市场竞争之中。以注意力和流量作为评价指标, 女性更容易成为媒介环境中被凝视的对象, 媒介内容生产的原始娱乐性动机可能转变为被平台流量驯化的盈利动机, 将自我展演的自愿劳动平台化、商业化、数据化。女性主播具身的呈现成为被平台驯化的身体, 从数字参与者转向数字劳动者。

在乡村女性多元形象展演的可见性背后, 技术因素可能促成了乡村女性群体的自我规训, 使其落入数据和算法等量化指标的陷阱, 表现在其关注点赞量、评论数等外化评价指标, 以及更加关注外界的评论内容并改变自我形象呈现等问题。例如, 一些主播为追求流量, 在短视频和直播中使用夸张甚至低俗语言。这样的外在呈现, 表面来看是自我的“表演”, 实际是剩余价值的不断让渡, 使其成为

资本所偏好的流量和数据，这本身也是对于独立女性自我意识的摒弃。

6 总结：零工困境与新灵工的“想象性解决”

首先，在数字劳动的视角下，虚拟空间的数字痕迹转化为数据资产，创造性的数字内容转化为内容资产，由于兴趣在休闲时间“玩手机”的用户，变成无意识的数字“玩工”。兴趣、注意与情感的投入变成“情感与注意资源”，成为商品化环节中的无偿劳动。同时，数字劳动的过程也逐步规则化和游戏化，通过直播获得打赏等行为，使女性主播疲于“赶工游戏”而获得虚假的满足感，逐渐将有意识的娱乐动机转化为无意识打开短视频、模仿他人等非动机驱使行为，将自由的意志转变为被无形资本和“监视资本主义”裹挟下的必然行为。数字劳动者将私人领域的家庭生活展演为公共领域他人的消费对象，将休闲时间转化为劳动时间，完成平台资本的增殖，将日常的社交生活、普通人的喜怒哀乐转化为“社交图谱”和“情绪密码”，这些都对主体性本身展开挑战，新的女性角色似乎难以逃避旧“零工”的窠臼。

其次，新女性的社会角色与“新灵工”（Free Worker）形式密切相关，她们借助数字平台进行内容创作、直播等活动，参与到数字经济中。这种形式的劳动既允许她们兼顾家庭责任，又提供了灵活的经济收益渠道，并通过主动性的自我表达和社会参与重新定义了乡村女性的社会形象。因此，在劳动过程中，数字零工的困境通过新灵工的形式得到想象性地解决，主要通过驯化与反向驯化、顺从与抵抗的双向过程中实现“新女性”劳动的自由性与灵活性，其中平台、算法等物质性因素^[31]，以及社会文化、规范、习惯等非物质性因素均影响劳动者的灵工与零工经济的过程。需要注意的是，并非时间灵活、自由化的劳动过程，或者说“不在场”“计件”式的劳动均可以被视为是灵工。随着平台资本注入灵工的劳动过程，她们仍然不可避免

地面临旧零工遗留下来的隐形剥削和“不稳定性”等问题^[32]：创意劳动容易沦为平庸复制和模因化的重复，灵工劳动也面临着计流量制、平台与社群的双重管控^[33]。因此，从主体来看，从零工到灵工需要劳动者具有一定的知识水平、认知高度与算法素养，主动抵抗算法驯化；从功能来看，平台也需要建立更为完善的补贴和劳动保障机制，避免灵工的异化；从关系来看，平台与个人之间需要进行“想象可供性”的调和，“平台的流动性本身就蕴含着团结”^[34]，从而缓解数字劳动的矛盾过程。

最后，地域再现和性别再现同样是短视频新媒介呈现“可见性”的新样态。短视频记录了女性的“声音”，也记录了她们生活和劳作的“影像”，从这一层面上讲，短视频的确是女性自身能动性的体现。若简单将乡村女性主播在短视频上的身体呈现与展演行为都归结为劳动异化与数字剥削，则同样忽视了主体的能动性和资本的二重性。有研究发现，短视频的数字劳动本身存在劳工分层现象^[35]，交叉性的视角可以帮助我们重新审视这一劳动关系的形成与发展。短视频客观上仍然是为社会大众提供媒介生产和媒介消费行为的中介物，在一定程度上为去流水线工业化的“温暖定制”提供了人性化趋势的缝隙。此外，在生成式人工智能发展的今天，技术不仅仅被看作“人的延伸”和对象化的器官客体，而更多地被赋予主体的地位，“人机协同”成为新的考察视角，智能技术作为重要赋权主体的社会作用凸显，一般智力、技术与劳动者的关系，也成为研究数字劳动的一个重要视角。

因此，本研究以交叉分析的视角，关注流媒体时代乡村地区女性短视频主播的数字劳动和情感劳动，以期为新时代乡村新女性的数字化生存和社会性别意识的变迁提供启发。本研究从数字劳动与媒介可见性之间的张力出发，落脚于社会性别与主体意识的建构，提出新“女性”与旧“零工”之间的对话，乡村地区女性通过新灵工的形式参与社会劳动，试图超越旧零工的劳动困境。通过短视频数字实践，新女性既通过数字介质实现了可见性，同时也存在被算法逻辑驯化重返免费零工角色的困境，

抑或是采取“逆算法”的主动实践,以流动的主体性表征深植于平台经济之下。同时,通过剖析束缚在宏大社会结构、中观家庭景观与微观媒介中的乡村女性群体,探索她们在反抗标签、自我想象和找寻身份认同的过程中,构造自己的多维生活样态、差异化的面向和性别意识的过程与方式。因此,本研究认为需要尊重一般智力与主体劳动的重新结合,认可乡村女性主播群体数字化生存的付出与实践,以及她们的情绪的价值、创意与灵感的价值,从而超越性别视角的数字不平等,从旧的“零工”到新的“灵工”,自主工作、灵活工作、创意工作,重归劳动的本真性与鲜活性,获得真正自由的身心发展。

作者简介

杨雅,女,博士,北京师范大学新闻传播学院副教授。研究方向:媒介技术与社会发展、认知传播效果研究。

苏芳,女,北京师范大学新闻传播学院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媒介技术与社会发展、认识传播效果研究。

李思雨,女,北京师范大学新闻传播学院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传播学。

参考文献

- [1] 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 第54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EB/OL].(2024-08-29)[2024-09-12]. <https://www.cnnic.net.cn/n4/2024/0829/c88-11065.html>.
- [2] 连芙蓉,朱玮.短视频平台中农村女性的实践主体性建构研究[J].新闻与传播评论,2024,77(1):82-92.
- [3] 张淑华,徐婷婷.当代乡村女性的网络空间生产与角色困境:以豫中乡村为例[J].新闻与传播研究,2022,29(11):17-38.
- [4] 廖苗,黄磊.国内外“数字劳动”研究述评[J].长沙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8,33(6):14-20.
- [5] 姚建华.从“休闲劳动化”到“劳动休闲化”:数字时代劳动的新想象[N].中华读书报,2023-02-08(10).
- [6] FUCHS C. Digital labour and Karl Marx[M]. New York: Routledge,2014:4.
- [7] KÜCKLICH J. Precarious playbour: Modders and the digital games industry[J]. Fibreculture Journal,2005(5):1-5.
- [8] 梁芳,汪怀君.数字劳工新形态的本质、异化与发展:以马克思人学理论为视角[J].合肥工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4,38(4):42-50.
- [9] 孙乐强.马克思“机器论片段”语境中的“一般智力”问题[J].华东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8,50(4):10-18.
- [10] 卡尔·马克思,弗里德里希·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二十六卷):第一册[M].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译.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442-443.
- [11] 吴静.平台资本主义的劳动协作与剩余价值形成的政治经济学解读[J].马克思主义与现实,2022(5):169-176.
- [12] 夏冰青.数字劳工的概念、学派与主体性问题:西方数字劳工理论发展述评[J].新闻记者,2020(8):87-96.
- [13] 吴鼎铭.网络“受众”的劳工化:传播政治经济学视角下网络“受众”的产业地位研究[J].国际新闻界,2017,39(6):124-137.
- [14] COLLINS P. Black feminist thought[M]. New York: Routledge,2000:18.
- [15] 苏熠慧.“交叉性”流派的观点、方法及其对中国性别社会学的启发[J].社会学研究,2016(4):218-241.
- [16] 陆新蕾,单培培.可见与不可见:短视频平台中农村女性的身体叙事研究[J].新闻与写作,2022(11):42-50.
- [17] 何志武,董红兵.可见性视角下移动短视频的空间生产、消费与价值悖论[J].新闻记者,2019(10):12-19.
- [18] 拉什.非线性模型中的个体化[M]//乌尔里希·贝克,伊丽莎白·贝克—格恩斯海姆.个体化.李荣山,范譞,张惠强,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20.
- [19] THOMPSON J B. The new visibility[J]. Theory, Culture and Society,2005,22(6):31-51.

- [20] 戈夫曼.日常生活中的自我呈现[M].冯钢,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29-30.
- [21] 王琴,刘雨.短视频传播的乡村新女性图景[J].中华女子学院学报,2021,33(3):66-72.
- [22] GRZANKA P R. Intersectionality: A foundations and frontiers reader[M]. Colorado: Westview Press,2018:99-101.
- [23] 刘娜.重塑与角力:网络短视频中的乡村文化研究[J].湖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8,45(6):161-168.
- [24] 潘可礼.亨利·列斐伏尔的社会空间理论[J].南京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2015(1):13-20.
- [25] 戴锦华.不可见的女性:当代中国电影中的女性与女性的电影[J].当代电影,1994(6):37-45.
- [26] MCNAY L. Agency, anticipation and indeterminacy in feminist theory[J].Feminist Theory,2003(2):139-148.
- [27] 苏熠慧.从“一元主体”到“多元主体”:“90后”打工女性主体的类型学分析[J].妇女研究论丛,2021(6):44-57.
- [28] 吴林原,陈丽琴.农村妇女参与基层治理研究述评与展望[J].哈尔滨师范大学社会科学学报,2021,12(2):54-59.
- [29] 周葆华.算法、可见性与注意力分配:智能时代舆论基础逻辑的历史转换[J].西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22,43(1):143-152.
- [30] 曾丽红,叶丹盈,李萍.社会化媒介赋权语境下女性“能动”的“可见性”:兼对B站美妆视频社区的“可供性”考察[J].新闻记者,2021(9):86-96.
- [31] 顾楚丹,杨发祥.驯化抑或互构:社交平台“数字灵工”的算法实践[J].探索与争鸣,2023(5):87-99.
- [32] 牛天.数字灵工的内卷化困境及其逻辑[J].中国青年研究,2022(3):71-79.
- [33] 燕道成,李采薇.数字灵工与短视频平台之间的控制与博弈:以团购达人为例[J].现代传播(中国传媒大学学报),2022,44(12):128-135.
- [34] 罗斯琦,陈佳慧.“流动”的悖论:平台组织管理与劳动者自主性[J].社会学评论,2024(2):176-198.
- [35] 倪小帆,刘勇.“劳工分层”:快手平台乡村主播的数字劳动研究[J].传媒观察,2023(11):32-38.

New Women or Traditional Zero Workers: A Study on Short Video Content Production and Subjectivity in Mobility of Rural Female Bloggers

YANG Ya, SU Fang, LI Siyu

School of Journalism and Communication, Beijing Normal University, 100875, Beijing, China

Abstract: Digital and emotional labor of female short video bloggers in rural areas require urgent attention from the intersectional perspective. From the vision of digital labor and media visibility, we proposed a dialogue between new women and traditional zero workers in the construction of social gender and subjectivity consciousness. Short video practice of women in rural areas not only achieved visibility but also faced the dilemma of being domesticated by algorithmic logic and returning to the role of free labor, with the representation of fluid subjectivity deeply rooted in the platform economy. At the same time, by analyzing how the rural women bound in macro social structure, meso family landscape and micro media, constructing process and ways of their multidimensional lifestyle, differentiated orientation and gender awareness were explored by label-resistance, self-imagination

and identity-seeking. It is necessary to respect the re-combination of general intellect and subjective labor, and to recognize the efforts and practices of rural female bloggers in digital survival. From zero worker to free worker, rural female bloggers are expected to work independently, flexibly and creatively, returning to the authenticity and vividness of labor.

Keywords: Intersectionality perspective; Digital labor; Rural women; Subjectivity in mobility; Short video platform

